

蒋廷黻

撰

中国近代史

蓬

沈渭滨 导读

莱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蒋廷黻

撰

中国近代史

蓬

沈渭滨 导读

莱

阁

丛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丛书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撰

沈渭滨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插页 5 字数 109,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2661-5

K·295 定价:8.80 元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

——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沈渭滨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

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①，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②。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一、蒋廷黻其人

1 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③。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④。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⑤，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忧解难”^⑥。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⑦。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⑧。他幼年失怙，父亲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⑨。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⑩。1906年

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①。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②。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③,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④。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 Parkville, 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⑤,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⑥。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Oberlin, Ohio)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⑦。当时,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⑧。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课程内容无

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①。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科学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②。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柏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③。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④。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⑤,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⑥。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⑦。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⑧。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

疑美国政府^⑦，他的亲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⑧。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⑨。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⑩，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⑪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

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②。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的影响。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导师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海斯教授这门课,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③。这对蒋廷黻有很大启发。后来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并对洋务运动作了积极评价。

所谓“族国主义”^④,就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趋向,成了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学家研究的时髦课题。他们探究这类国家所揭橥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架,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蒋廷黻作为海斯的学生,又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对这一历史动向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后来,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显然渊源于此。他写道: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⑤

很明显,这一历史观正是他从导师那儿得到的感悟。后来,他还十分注意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化历史,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复兴^⑥,这也与他在哥大研究院受到的训练有关。

研究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势必要研究帝国主义政策。蒋廷黻在海斯和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的启示下,选择当时欧洲最主要的帝国主义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放在反对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研究上。他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⑦,于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8岁。

从 17 岁到 28 岁,蒋廷黻在美国生活了 11 年。他由一个农村小学生成了一名洋博士,可谓学业有成。毕业那年,他的博士论文照例由哥大出版社出版发行^⑧,而那年又恰巧是以麦克唐纳为领袖的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不啻为他的这部学术著作提供了应时之需的销售契机。遗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国工党,上台后丝毫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政策^⑨。他的研究与实际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观察和分析国共两党斗争时看好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犯错误的一次预演^⑩。

11 年的美国生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宗教信仰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几乎不看纯文学作品;他能讲一口流利而略带乡音的英语,但讲起国语来却满口是浓重的湖南官话,以致后来他做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因发言常用英语而遭到时人的批评^⑪。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忘记祖国。1921 年他在哥大研究院时,适逢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留美学生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五四”时期的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宗旨^⑫,积极活动。蒋廷黻即是后援会英文刊物的编辑,是活跃分子^⑬。在声援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中,他结识了同是后援会成员的唐玉瑞小姐,两人相恋,到 1923 年蒋廷黻博士毕业、归国前夕结婚^⑭。

博士头衔,新婚燕尔。28 岁的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哥伦比亚大学送走了这个“新史学”的中国信徒,中国史学界迎来了一位新潮学者。

2 新潮史学家

1923年,蒋廷黻携眷回国后,应北方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之聘,出任历史教授。他在南开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学问上。首先,他深知自己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国学基础很差,必须先充实自己。为此,他从重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诗词、文章^⑤。

其次,他在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在哥大做研究时就已养成。到南开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美国人马士(Hosea B. Morse)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⑥。这部书是根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马士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述是模糊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马士很少使用中国政府的官方材料。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他们提出过意见吗?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这些问题蒋廷黻在南开上课时就已感到困惑^⑦。于是他决心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和鉴别有关史料。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受到过历史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懂得怎样判别资料,怎样选编^⑧,所以他在南开的六年中,以极大精力收集和 research 外交文献,后来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一书,就是在南开时奠定基础的。这项研究,在当时是开拓性的,虽然在他之前有人写过外交史^④,但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从基础工作做起。陈之迈在他所写的蒋廷黻传记中提到过北方的学风背景说:“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⑤可见蒋廷黻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可以说,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实在是从蒋廷黻开始的。他自己也说:“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⑥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卓识,推见未来。蒋廷黻自小去国,对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为此,他利用假期和讲学的机会,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察研究。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⑦。

南开大学的六年,蒋廷黻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显露头角,但更大的发展,则在进入清华任教之后。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欣然应聘,一到该年夏季与南开聘约结束,便束装北上,践约赴任。

罗家伦是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的校友,也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和蒋廷黻认识较早,相知甚深。1926年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将清华大学改为国立^⑧,任命罗家伦

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上任伊始,即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⑤4},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聘请教授、尤其是学院院长和系主任时不徇私情,专重学问、才能;其次是终止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将之改造为男女同校、提供四年正规课程教育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再次是使清华脱离原由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监管的体制,改由教育部直辖;同时加强校舍和教学设备的建设^{⑤5}。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家伦选聘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蒋未到任之前,由罗兼任。

蒋廷黻于1929年夏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后,立即发现清华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缺乏能开中国自己课程的教授。他们可以照搬美国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开设有关中国国情和社会演变的课程。例如教政治思想史的,可以从古代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没有人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史。历史系也有类似情况。留美归来的教授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老教授大都是断代史或是某一种古籍的专家,他们对版本或训诂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则没有多少见识。他认为这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是一种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继续下去^{⑤6}。为此,他在尊重老学者的同时,引进一批年轻教授,给他们两三年时间准备开一门新课,提供参考书和配备助理人员^{⑤7}。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历史系逐步配备了较强的阵营:由雷海宗主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主清史(北大教授、兼任)、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俄国人)主俄国史,蒋廷黻自己则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⑤8}。同时规定

学生可以兼修旁系各科。显然,经过他的改革,这个阵营确是全国一流的。

蒋廷黻主持历史系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原则上,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历史系毕业后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学教书,待遇既低,又无图书资料,容易荒废专业。所以他对申请读历史系的学生总是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⑤。但当他一旦发现优秀青年,他都鼓励他们进清华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在30年代,中国尚无日本史、苏联史、蒙古史、泰国史和越南史的专家。当他发现一个青年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时,他就说服他们去清华研究院学习相关语言。成绩优秀者,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例如他鼓励王信忠学日本史并推荐其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日本史,二年后回到清华,聘为讲师;又如朱谦之研究苏联史而去英国学斯拉夫语;邵循正在清华毕业后准备研究蒙古史而到巴黎学习波斯和阿拉伯语^⑥等。当时,蒋廷黻已经是清华校务委员会的评议员。他对学校建设、学科改革、推荐和选派学生出国深造等学校大计,有充分的发言权^⑦。

在清华任教期间,蒋廷黻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他继续在南开大学时已奠定基础的资料搜集和鉴别工作,并把搜集范围扩大到近代史领域^⑧。经过苦心孤诣的不懈搜求和严谨缜密的鉴别编排,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辑录1822—1861年间(道光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外交文献259种(篇),中卷辑录1861—1895年(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外交文献540种(篇),两卷共计799种(篇),是当时中国

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繁的外交史专题资料集。在编辑资料的基础上,他发表了一批有独识、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北海图书月刊》二卷六期,1929年)、《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六卷三期,1931年)、《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等,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特别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用官方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③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涟漪千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认为他太偏向清政府,或说他居然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实属无礼之举^④。尽管各方反应不一,但他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的学术地位,则是众所公认、无可动摇的。

学术研究犹如着纸的墨点有渗化效应,由点及面,层层拓展。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到许多问题若仅局限于外交一点很难说清说透,必需追溯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组织、经济变化,这就促使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在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处于初生婴儿阶段时,这一悟性对蒋廷黻来说,无疑是“够刺激”的。他说:“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⑤从此,他把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生最大的志愿^⑥。可惜,后来他从政做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计划。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牵梦萦之所在,1965年他从官场退下后,还计